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 与路径突破 ——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张淑雯

【摘 要】文章基于制度主义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探析了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从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路径锁定，以及在住在国排华环境下族群认同强化的路径依赖，揭示了其中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偶然性事件等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机理。同时，结合制度变迁理论，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就增强东南亚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以期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演进有所启示。

【关键词】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制度主义；制度变迁；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4.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22)06-0134-19

近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其中伴随着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演化，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再到“再华化”等，不同身份认同相继产生并在一定时期并存。

在对东南亚华人认同的调查中，一方面，如《星洲日报》的调查所示，有 88.3% 的受访者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性，并表示继续身为华人的意愿^①；另一

【作者简介】张淑雯，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问题研究”（20@ZH037）；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华商企业代际传承及其治理的家国情怀研究”（2022WQNCX006）。

① 转引自茅根红《海外华侨华人世界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27 页。

方面,在2015年一项对180名华裔中学生的调查中,68.1%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地道的本国人”;同时,还出现几乎所有华侨华人女性不接受与土著男性通婚的现象^①。这些调查说明,东南亚华人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认同等层面呈现出多元甚至是杂糅的复杂性。东南亚华人这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是如何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未来将会如何突破和演化?本文尝试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历史演化路径做制度主义机理的分析,并就增强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

一 研究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研究回顾

目前全球有6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人数最多的聚集地,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73.5%,也是华商最聚集的地区^②,华侨华人在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耕耘。自万隆会议以来,华人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是东南亚各国绕不开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不断崛起,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往来日益增加,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问题逐渐成为海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其中,对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问题,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做了大量的调研与探讨。

在文化方面,华侨华人群体最早形成自我认同,早期的华侨华人因为在异国生存时政治地位地下,根据血缘、语言而形成群体认同,以进行自我保护^③。后期随着华人与本土民族的融合,虽然其使用的语言已经不完全是华人方言,但也不是当地土著语言,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自我认同为华人群体^④;同时,为了尽可能地传承中华文化,华人群体不断地以私塾、义学的方式自发进行华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⑤。除了语言以外,海外华人在当地长期的生活中,受到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土著文化的多重影响,逐渐形成独特的习俗与宗教文化,与当地

① 赵惠霞、樊静静 《新时代菲律宾华人华侨的文化属性与身份认同》,《今传媒》2020年第4期。

②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王辉耀、康荣平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③ 参见〔美〕宓亨利著,曾德彰译《华侨志》,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2-33页;庄国土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陈志明 《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⑤ 张西平 《简论孔子学院的软实力功能》,《国际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

土著族群区分开来^①。同时,中华婚俗文化、婚姻观念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对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21 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人社会出现了“再华化”现象,华文教育和儒学重新兴起,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③。

在经济方面,华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动力为经济利益驱动^④。而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与安全感,华人在当地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社团^⑤。通过组织、社团的连结,一方面,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甚至有诸多学者将华商商业网络称为“华人经济”或“华人经济圈”^⑥。

在政治方面,早期华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受中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和东南亚民族主义政策的影响^⑦。从清末到现代,中国经历了思想、文化、体制的重大变迁;新中国成立以后,也经历了冷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转折,不同时期中国的华侨华人政策均有区别,对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造成了重要影响^⑧。而东南亚各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受民族主义思想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对于华人参政进行了诸多限制,叠加层出不穷的排华事件,更影响了当地华人的身份认同^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民主化进程逐渐发展,华人政党在参政的过程中,出现了典型的华人族群民族主义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当地华人的族群身份认同^⑩。

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国内外学者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主要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三个方面^⑪。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而言,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乃至族群认同,都是社会变迁中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有必

① 张钟鑫 《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研究 (1819—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95—96 页,第 109 页。

② 曹云华 《菲律宾华人的婚姻与家庭》,《社会》1999 年第 8 期;张雪 《18—19 世纪吧城华人社会婚姻状况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3 页。

③ 韩晓明 《从“再中国化”到“再华化”——百年间东南亚华人的身份重构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④ 庄国土 《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一》,《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

⑤ 张晔 《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52—60 页。

⑥ 梁英明 《关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⑦ 姜广元 《现当代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20—25 页。

⑧ 任贵祥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 60 年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⑨ 邓仕超 《“五月骚乱”以后印尼华人的政治参与》,《东南亚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⑩ 孔祥利 《民主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治参与——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5 期。

⑪ 王赓武、林金枝 《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南洋资料译丛》1986 年第 4 期;王付兵:《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1 年第 4 期。

要将政治、文化、经济等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因素纳入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深入探讨。

在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中，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以社会定位为中心的身份认同^①，以及以职业等分类的群体身份认同^②的研究，认为制度构建和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群体的身份认同。因此，本文拟将制度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对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考察中，探讨影响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制度性因素，并就增强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

（二）制度主义理论框架

1.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来自生物学，最早是用来描述过去的随机因素对物种的现在和将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只要某物种进入某路径，就将在该路径上形成惯性或趋势，很难脱离。美国经济学家戴维（David P. A.）将路径依赖概念引入分析技术领域自我强化的现象，即技术系统的变迁依赖于过去的技术路径选择^③。随后，赛多（Sydow）等人进一步将路径依赖解释为连续不断的过程，在个人偏好或偶然因素的作用下，进入到正反馈、自我强化的阶段^④。诺思（Douglass C. 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到制度领域阐释了制度的演进。他认为，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样存在于制度变迁中，如果制度变迁进入某一路径，就会有惯性力量让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从而产生路径依赖^⑤。因此，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于，个人的选择取决于所持有的信念，由此造成了人们行为的变化；反过来，影响路径选择的因素，正是过去衍生出来的制度与信念^⑥。基于

① 参见宋道雷《身份认同与制度制定权：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解释机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王亮《制度的建构与媒体的共谋——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10期；翟秀海《制度视角下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问题研究》，《农业经济》2009年第4期；许丽明《制度建构与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从制度建构层面解构农民工身份问题》，《特区经济》2011年第5期。

② 参见Hira A. & Hira R.,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tradictory Notions of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9, No. 2, 2000, pp. 267 – 282; 曲正伟《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期；尹弘飏、操太圣《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身份认同——制度变迁与自我重构》，《教育发展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pp. 332 – 337.

④ Jörg Sydow, Arnold Windeler, Guido Möllering & Cornelius Schubert, *Path-Creating Networks: The Role of Consortia in Processes of Path Extension and Creation*, 21st EGOS Colloquium, Berlin, Germany, 2005, pp. 345 – 368.

⑤ 〈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0页。

⑥ 〈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胡志敏译《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

此,本文所探讨的路径锁定也可以理解为,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等历史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认知被锁定在某种路径上,又受社会变迁与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自我强化。

有学者基于戴维和诺思的相关研究,将“路径依赖”这一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概念的特征归纳如下:一是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变迁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的选择;二是强调时间的重要作用,提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自我强化,进而被扩大和发展,进一步加固这种“锁定”^①;三是强调偶然性历史事件对系统发展的轨迹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发展轨迹往往会被偶然性历史事件影响,最后产生与初始预期大相径庭的结果。由此看来,路径依赖源于一个又一个事件系列建构的自我强化的整体过程,而偶然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容易导致后期发展路径和绩效的偏差。

2. 制度变迁理论

路径依赖理论虽然能够较好地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展现制度的自我强化效用和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但是对于制度变迁的主体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主体能动作用,采取有意识的策略行动进行路径创造和突破缺乏解释。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其主体——“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制度变迁的过程为制度“供给—需求”不均衡时,制度变迁主体追求获利机会的交替行为^②,即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产生了整个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既可以由政府或官方以法律、政策或命令的形式强制启动,也可以由民间团体因利益需求自发启动^③。因此,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3. 研究框架

本文借鉴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理论,对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演变中的路径依赖、制度供给与需求,以及主体、社会环境等因素的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见图1),以揭示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中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最后,结合制度变迁理论,根据制度供给主体的不同,就增强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出路径突破的方法。

① 时晓虹、耿刚德、李怀 《“路径依赖”理论新解》,《经济学家》2014 年第 6 期。

② 〈美〉道·诺斯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 年第 3 期。

③ 林毅夫、蔡昉 《我国经济改革顺序的思考和突破口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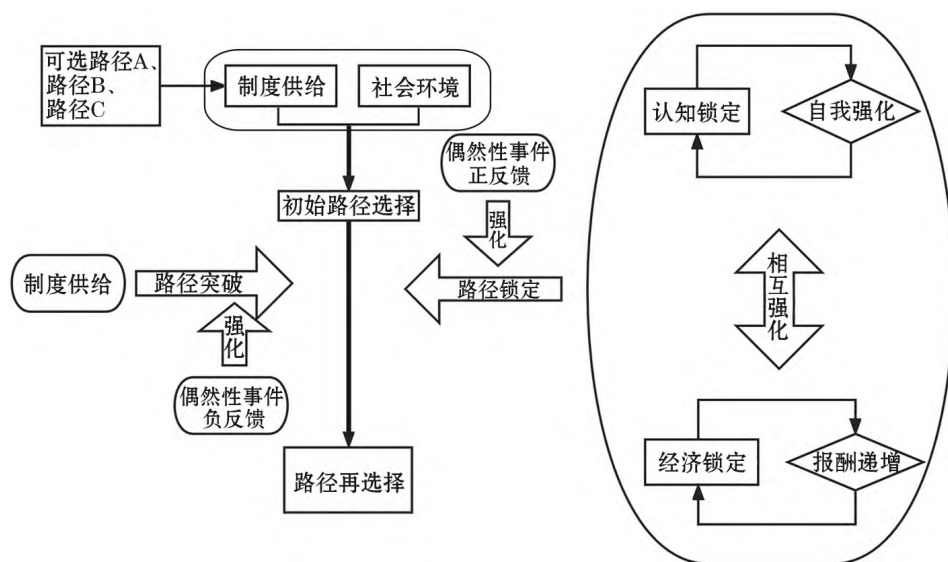


图1 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变中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如果回到历史演进的初始可能的路径选择，华人群体看似会拥有可选择的A、B、C等不同的认同路径。但是，基于当时中国和华侨华人住在国的制度供给与社会变迁，东南亚华侨华人大部分选择了“落地生根”，在政治上认同住在国，成为住在国的族群之一，同时努力保持自身的华人文化认同。随着时间的发展，在社会制度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迁的情况下，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的作用，认知的累积效应和报酬递增会强化原有认同的固定化和延续^①，这就是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锁定。而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演化的路径如果要发生改变，一种可能是，产生新的制度供给，且新制度供给的群体收益能够超越改变原有路径带来的制度成本；另一种可能是，原有的路径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演化的轨道可能发生改变”^②。

二 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中的路径锁定和路径依赖

（一）社会变迁、制度供给与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形成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时间的存在意味着，在制度变迁的演进

^① 参见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8页。

^② Paul A. David, “Path Dependence: A Foundational Concept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Cliometrica*, Vol. 1, No. 2, 2007, pp. 91–114.

过程中,历史对于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考察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新奇”(novely)点^①时期的社会环境与制度供给,有助于理解东南亚华侨华人身份认同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与特征。

1. 从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

清末与民国这一时期,由于东南亚国家尚未取得民族独立,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出于利益需要积极引入了大量华工,中国移民东南亚的人数迅速增加。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各自出台了《国籍法》,均以血统主义作为认定国籍的依据,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普遍欢迎,但也使大多数华侨拥有了双重国籍。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华侨华人高度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出钱出力,团结一心,主动援助和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华侨毁家纾难的事迹比比皆是。例如,为筹措抗经费,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获得了海外华侨华人的积极响应。从1937年到1939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5115万元、国防公债有626.5万元等;直到1941年夏,华侨共购债6.82亿元;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高达11亿元国币,超过国民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的1/3^②。对于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未曾偿还,事实上等同于捐款。此外,东南亚华侨除了捐款给国民政府外,还积极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据估计,东南亚侨胞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捐款至少有1000万元^③。新加坡华侨在抗战胜利后举着“祖国万岁”的旗子游行,充分说明了当时海外华侨对自身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短暂延续了民国政府时期对华侨国籍的认定方式,同时也明确表示保护海外华侨的合法权益^⑤。1955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及东南亚各国独立建国后受冷战影响而对华侨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在国际上主动提出,虽然各个国家的制度不同,但理应和平共处。进而在万隆会议上,中国对于华侨国籍问题的态度明显转向,不仅放弃承认双重

① 威特从认识论角度将“新奇”界定为“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并认为“新奇的产生”是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参见 Ulrich Witt ed.,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 184.

② 邹挺超、郑宗伟《心系祖国 毁家纾难——抗战时期侨批中的家国情怀》,《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4日。

③ 邹挺超、郑宗伟《心系祖国 毁家纾难——抗战时期侨批中的家国情怀》,《中国档案报》2020年9月4日。

④ 《老照片:日本鬼子投降 海外华人热烈庆祝抗战胜利》,搜狐网,2018年8月15日, https://www.sohu.com/a/247331889_482071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江西政报》1949年第3期。

国籍,而且对华侨入籍东南亚住在国更是乐观其成^①。那么,对于广大华侨来说,无论其曾经抱有何种意愿,加入住在国,变成住在国公民,都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虽然国籍和身份改变的过程历尽艰辛,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华侨社会逐渐过渡到华人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虽然华侨华人群体在最初有着强烈的祖籍国认同倾向,但是由我国国籍政策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情境所决定,东南亚大部分华侨逐渐放弃了政治上认同祖籍国的路径选择,入籍住在国,形成了政治认同的“锁定”。

2. 排华政策下的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各国陆续独立建国。但是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土著族群均选择建立自身种族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国家^②;同时,由于冷战意识形态,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共产主义采取敌视态度。

由此,在政治上,华人对住在国的忠诚度遭到质疑,基本政治权利被限制,只能作为二等公民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华人的传统节日庆典、华语的使用、华文教育的发展等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遭到刻意打压,举步维艰。

在经济上,华人经济被认为是“殖民统治时代的残余”或者是一种“定居的殖民主义”^③，“剥削”了当地土著族群,排挤和抑制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华侨华人住在国政府纷纷制定专门政策,严格限制华人经济发展。例如1956年,印尼资本家阿萨阿特发表“华人控制着我国经济”的主题演讲,掀起“阿萨阿特运动”,排斥华人资本^④。随后,印尼1968年第6号法令、1980年总统第14号及第14A号决定书等一系列法规,均对华人资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后来尽管住在国政府转向施行自由经济政策,直接促进了华人经济力量的增强,但客观上造成“华人支配国家经济”的刻板形象,使华人在东南亚各阶层中长期被视为“外人”。

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东南亚国家不同族群之间隔阂加深,在强化同一族群内部认同的同时,又增加了对外来族群的误解、猜疑、敌对和冲突。当局者正好利用“华人性”这个议题,达到边缘化华人社会的政治目的。华人性被污名化、歪曲和丑化为不忠诚、贪婪、排他性等民族劣根性的代表,以此煽动极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18-219页。

② 王九龙《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以马来西亚、印尼为案例的分析》,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81页。

③ 胡尧瑶《20世纪初期印尼排华骚乱的经济因素》,《理论观察》2007年第1期。

④ 廖建裕《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第69页。

民粹主义，引发住在国主体族群对华人的歧视。这一境遇使东南亚华人长期有着不同程度的“寄人篱下”感、不安全感和危机感，反而加强了华人的内部族群认同，强化了华人群体作为住在国少数族群（除新加坡外）不同于当地主体族群的身份认同。

在确定住在国公民的政治身份之后，面对东南亚各国政府歧视性的制度供给以及排华的社会情境，作为住在国族群之一的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得以强化，并且在社团、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实现了发展。

（二）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自我强化与报酬递增

诺思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初始环境会对未来制度的变迁产生重要而长期的影响，但要维持路径锁定，必然存在着自我强化与报酬递增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对发展轨迹形成依赖^①。与其他制度变迁一样，华侨华人族群认同也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在认知的自我强化和经济收益的报酬递增中形成了路径锁定。所谓报酬递增，在经济学中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各种生产要素按相同比例投入时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加现象。在本文中，笔者借以描述华人族群认同形成以后，维持族群认同的成本几乎差别不大，却能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现象。

1. 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的强化

由于东南亚诸国政府长期采取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华人族群认同反而被强化。土生华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地文化同化，但也开始审视和思考自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生存空间，不断向国际华侨华人寻求合作与帮助，进一步促进了华人族群认同的自我强化。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华侨华人组织的众多国际性华人社团联谊活动在东南亚国家成功举办，极大地加强了华人群体的自我认同。如 1971 年由张发奎将军发起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至今已累计举办了 31 届，举办规模从第一届的 250 人扩大到逾 3000 人、100 多个客家组织^②，在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中影响力极大。此外，还有 1981 年开始举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9 年开始举办的海南乡团联谊大会、1990 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1993 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会、2001 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2013 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等，不胜枚举。截至 2016 年，海外华侨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74-76 页。

^② 巫秋玉《论“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与中国客家侨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世界客属第 30 届恳亲大会客家论坛在吉隆坡举办》，《客家文博》2019 年第 3 期。

华人社团数量已经多达 25 000 多个^①，成为“支持海外华人社会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②。

这些以华人聚会、活动为代表的民间群体组织，也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最常见的方式。此类活动大多数是东南亚华侨华人自发兴办的，最终由自发的个体行为发展成自觉的群体行为。参与组织或融入群体的个体成员逐渐结合成紧密的华人共同体，形成共同体价值，包括强烈的归属感、深厚的同胞感情、一致的群体目标、共同的群体规范等。这种自觉的组织化群体行为，促使华人共同体的核心内涵逐步固定成华人群体的独有文化标识。因而，由于文化的累积效用，这些文化活动通过行为和惯例的延续构建和强化了华人族群意识，唤醒其集体记忆和群体认同，进一步增强其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渐成为东南亚华人群体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举措。

2. 东南亚华裔在族群认同下的报酬递增

东南亚华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华裔，由于出生或成长在东南亚，与祖籍国距离较远，且经常遭遇住在国政府和社会的排斥，形成了天然的危机意识，普遍缺乏安全感，亟需安全保障。

在恶劣的竞争生存环境中，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难以得到当地政府支持，反而伴随着华人企业家财富的积累，遭受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嫉恨、围堵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人企业家需要借助其他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宗亲社团和同乡会馆等，对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很多东南亚华裔在最初寻求合作伙伴时，得益于会说一口流利地道的方言或普通话，并最终逐渐形成以宗亲、乡土、行业关系为纽带的华商网络。在这样的宗亲会、同乡会和商会的组织下，东南亚华人群体、华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仅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安全保障，使华商在住在国遭遇排华浪潮时能够及时得到帮助，而且逐渐形成“华人经济圈”，使华商群体获得报酬递增的效果。

由于东南亚华裔在当地普遍处于经济上地位举足轻重、政治上地位低下的状况，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为了改善生存环境、拓展发展空间，1991 年，华商群体在新加坡举行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吸引了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约 800 名华商。其后，该大会每两年在不同地方举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15 届，影响力越来越

① 纪娟丽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达 2.5 万多个》，《人民政协报》2016 年 5 月 18 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mJVwsP>

② 赵阳 《前景光明 海外华文媒体正处在蓬勃发展期》，中国侨网，2007 年 9 月 4 日，<http://www.chinaqw.com/zgqj/qjdt/200709/04/86285.shtml>

越大，其中第六届和第九届大会均有超过 5000 名华商参加^①。相较于华人宗亲会馆之间或宗亲会馆内部的联谊活动，世界华商大会无论是整体规模、筹办质量，还是社会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更胜一筹。

东南亚向来有“华人钱库”之称。根据庄国土教授课题组估算：至 2008 年，东南亚华商的资产约 15 051 亿美元。在东盟前五国中，新加坡为 5986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39.77%；泰国 3853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25.6%；印尼 1866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12.4%；马来西亚 1812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12.04%；菲律宾 797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5.3%^②。可见，虽然华商在东南亚各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一，但均是当地极其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即使近年来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华人经济也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6000 万华侨华人中有很大的比例经商办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华商群体。据估算，目前全球华商企业的总资产规模约为 5 万亿美元。由于东南亚华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东南亚地区无疑成为海外大型华商的聚集地。根据《亚洲周刊》2016 年全球华商 1000 强排行榜，海外华商入榜 53 家，其中东南亚地区占有 52 家^③。这表明，东南亚华人经济力量巨大，是当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柱。

2007 年多伦多大学韦尔曼（Barry Wellman）教授通过对 308 名华裔创业者的调研发现，为了推动华裔移民企业家的跨国创业和交流，华人商会和专业协会在提供商业资讯、搭建交流平台、组织考察团赴中国访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在本地经营的企业家，跨国创业或经营的华裔企业家拥有更大、更多元化和更多资讯的关系网络，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互联网，也更有可能加入商会^④。蒙英华博士提出了华商网络的信息交流模式（见图 2）。显然，凭借华人族群认同而形成的华商网络，包括非正式的社会和社团组织组成的商业纽带，能够有效地帮助华商群体降低交易成本，形成更大的竞争力^⑤。这凸显了华商群体在族群认同中获得了报酬递增的效果。

① 周聿峨、李亚：《世界华商大会：连接世界的网络》，《公共外交季刊》2012 年第 4 期；白星星：《英国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举行》，《中国会展》2019 年第 22 期。

② 庄国土：《21 世纪前期海外华商经济实力评估》，《南洋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③ 王辉耀、康荣平：《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3 页。

④ E. Ooka, B. Wellman, "Does Social Capital Pay Off More within or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alyzing Job Searchers in Five Toronto Ethnic Groups", *Inside the Mosaic*, 2006, pp. 199-226.

⑤ 蒙英华：《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证据》，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08-110 页。

文化认同产生了正反馈作用。

在印尼，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首都雅加达于 1998 年 5 月 13 - 16 日爆发了以华人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流血骚乱，史称“五月骚乱”。短短三天时间，印尼有 1190 人被烧死，168 名妇女遭到强奸、轮奸与性残害，其中大多数为华人^①；9965 间建筑遭到破坏，3067 辆汽车等交通工具被焚毁^②，华人的购物广场、店铺、住宅和办公楼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数十万华人被迫出逃，辛苦积攒的财富毁于旦夕，沦为难民。诸如此类排华事件，在二战以后的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如印尼、越南、缅甸、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国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这些排华事件促使华人警醒，他们与原住民不同，并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不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伴随着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印尼华人开始“再华化”，主动重新学习华语，建立印尼华裔总会、百家姓协会等华人社会组织，创办《千岛日报》《世界日报》等华文媒体，华人的凝聚力和族群认同进一步增强。排华事件的发生，可以说起了正反馈作用，强化了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趋势。

事实上，在经历了长期的排华政策之后，东南亚诸国也逐渐意识到了华人身份认同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开始转向多元文化共存的政策方向。1987 年以后，柬埔寨政权改变原本的排华政策，开始允许华人自由经商，取消了华人从业的多项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和争取逃居海外的华人回柬定居和经营工商业^③。1997 年后，印尼瓦希德政府开始解冻对华人的一些禁锢政策，允许开办华人报纸，初步放宽了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并于 2000 年签署了提倡民族平等的第 6 号总统令，废除了歧视华人的十多项法规条例，华人政治地位有所改善。梅加瓦蒂总统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些对待华人的政策^④。这些政策从政治、教育、语言、文化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华人族群，为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说，这些政策对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可能同时产生正反馈和负反馈作用，在使华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到更好保障的同时，也可能使其族群认同和华人文化认同随着代际的更迭趋于弱化。

① 黄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 年至 2004 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88 页。

② 李明欢 《雅加达日记》，（香港《地平线》1998 年 11 - 12 月号；朴萍《挂羊头卖狗肉的“融合”》，（香港《地平线》1998 年 7 月号。

③ 庄国土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东南学术》2003 年第 2 期。

④ 黄昆章 《论印尼五月暴乱的性质和影响》，《八桂侨刊》2000 年第 2 期。

三 东南亚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路径突破

路径依赖一旦形成,要打破或逆转,成本将十分高昂,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径依赖形成以后将无法改变。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往往相伴而生。我们可以通过引导或增加制度供给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当制度创新的成本低于制度创新的收益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挣脱原有路径依赖的束缚,实现路径突破。如前文所述,华人的族群认同可能随着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及代际的更迭而趋于弱化,我国需要在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之上,争取一定的路径突破,以巩固和增强华人的族群认同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东南亚华人、华商民间主体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以政策提供制度变迁的动力,共同作用,以实现可能的路径突破。

(一) 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路径突破

林毅夫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有“自发性”,往往是由个人或小组寻求对自身最有利的制度安排的过程^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通过影响原有制度接受者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情况,可以使原有的制度安排无法达到最大化收益,从而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形成制度供给。

1. 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华商网络发展

中国是东南亚华人的祖籍国,东南亚华商群体本身就存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制度供给,但由于华商群体在经济政策领域受到诸多限制,这一制度供给有所不足,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扩大原有制度供给的收益,以增强制度供给。

华商网络作为依托血缘、地缘、业缘等“五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华人商业网络,本身就是以中华文化为精神支柱的社会文化伦理网络^②,因而常常能够在跨国互动中给予成员密切的相互支持,推动其成长。改革开放40多年中,我国首先实行的是“引进来”战略。华商网络以港商和东南亚华商为主体,全方位融入中国40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发展格局,既成为享有祖籍国市场发展红利的先行者,快速发展壮大,也为中国企业带来全新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

^① 林毅夫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② 刘权、罗俊骞 《华商网络研究现状及其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世界贸易格局时而动荡的背景下，传统华商网络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主要问题有二：第一，大部分华商经营范围较窄，实力有限。东南亚华商中实力雄厚、成绩斐然的企业数量极少，华商网络中仅有不足 5% 的大型企业^①。即使是传统的大型华商企业，由于主要从事利润率较低的餐饮业、皮革业、房地产业、服装业等传统行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高附加值贸易中逐渐出现颓势，亟需有实力、有技术能力的“新鲜血液”注入华商网络。第二，“逆全球化”思想兴起，华商务受排挤。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加上 2020 年流行至今的新冠疫情，“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华商仍有可能受到当地法律、政策、民众的排挤，甚至成为攻击的对象。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与沿线国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前景^②。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扎实举措，展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增强了东南亚华商的信心和决心，其也希望与日益强大的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

基于此，鼓励中国企业参与东南亚华商网络发展显然是一个互利双赢的重要举措，将会受到双方的欢迎。而中国企业通过与东南亚华商的协作交往，推进商业共赢、加深东南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无疑可以进一步增进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增强其对祖国及中华文化的认同。

2. 支援东南亚民间华文教育

文化的产生具有学习的累积效应，因而华语教育会形成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制度供给。华语教育历史上长期受东南亚各国的打压，制度供给有所不足，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支持，增强制度供给。

随着华人移民的迁入，东南亚的华语教育早在殖民地时期就以私塾教育的形式在当地蓬勃发展起来，有力维系了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20 世纪下半叶，由于东南亚各国针对华人族群采取排斥和同化政策，大规模强行关闭华语学校，禁止使用华语教材，导致华语教育出现了衰落和空档期。进入 21 世纪以后，针对华语教育的限制才逐渐放松，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重启华语学习热情，华文教

^① 刘华清《中国企业借助海外华商网络“走出去”策略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24 页。

^② 《经国务院授权 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政府网，2015 年 3 月 28 日，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3132427/bf79WujSZM8s9up-WkmLx2BEH1U0xFDmxpbA6h6UKFwBM5QUZo1NPbXqgBE-xjK10woJCMY3FQByhtZqbaVa4qdeV_KSpzkbTagQWvk-xytnXT3

育重新得到快速发展。

以华文教育都曾被官方压制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例。马来西亚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后到 1990 年之前,始终针对华文教育进行约束与限制。但是在几代华人的不懈努力下,马来西亚还是建立了完整而独立的华文教育体系。2018 年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共有 1298 所,而从马来西亚独立到 1990 年之间,政府设立的华文小学仅 6 所,绝大多数华文小学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建,超过 90% 的华裔子弟就读华文小学^①。与马来西亚相似,荷兰殖民与日本占领时期,印尼的华文教育也遭到严厉的镇压,其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二战后,由于中国是战胜国,华侨扬眉吐气,华语教育有过短暂复苏。据《南洋年鉴》记载,1948 年印尼共有华文学校 622 所^②,华侨华人群体学习华文热情高涨。但 1965 年苏哈托上台后,印尼采取了严厉的排华和同化政策,取缔所有华文学校,甚至禁止使用汉字和中文名字,致使华文教育在印尼出现了 30 多年的空白期。直到 1999 年,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华文教育才得以解冻,在华人群体中迅速复苏。据调查,2010 年印尼华语补习班约有 1000 多所,学员多达 20 多万^③。东南亚华人对于华文教育的需求与热情可见一斑。

但是,毕竟经历了长期的打压和限制,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均面临严重困难。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目前东南亚华文教育基本处于零散状态,情况复杂,发展不平衡^④。由于华文教育的长期断层,东南亚各国现有的师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华人群体的现实需要,无法组织人力、财力编写适应当地社会的华文教材,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质量与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东南亚民间华文教育进行支援,鼓励我国华文教育相关部门和机构从师资、教材、教学等方面对东南亚华文教育机构进行对口资助。华文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发展,无疑是增强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二) 强制性制度供给下的路径突破

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官方政策或法令主导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制度供给,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成本,充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加快制度

①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调查研究及资讯组《2008 年至 2018 年华小学生人数的演变,以及华小建校和迁校的发展实况》,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18 年 9 月 3 日, <https://jiaozong.org.my/v3/index.php/%25E6%2595%2599%25E6%2580%25BB%25E8%25B0%2583%25E6%259F%25A5%25E6%258A%25A5%25E5%2591%258A/4755-20082018>

② 郁树馄《南洋年鉴》(第 5 版),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1 年,第 105 页。

③ 黄耀东《东南亚华文教育现状和出路》,《东南亚纵横》2010 年第 1 期。

④ 郭熙《关于华文教学当地化的若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8 年第 2 期。

变迁的过程。

1. 考虑适当引进华人人力资源，实现利益双赢

传统侨务政策主要注重引进外资和东南亚华人人才，鼓励东南亚华人人才“回国服务”。大量华侨华人回国投资以及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回国服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人在住在国政治、经济方面都有着相当影响力，也为增强东南亚华人群体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与认可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企业家与专业技术人才只是东南亚华人群体中极少的部分，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东南亚华人来说，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最初动机在于家国情怀和宗亲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①。对于制度变迁的主体而言，应当考虑华人群体作为“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让他们在学有所成以后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通过促进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群体之间的往来和出入境条件，借助中国丰富的工作机会，给予通晓中华文化的华人工作机会，无疑对今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人群体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有着积极意义。

2. 重视东南亚华文媒体工作，传播中华文化

东南亚华文媒体随着中国的海外移民而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 1815 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拥有着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根据 2017 年举办的世界华文论坛统计，海外华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共有 1019 家^②。海外华文媒体的蓬勃发展是 6000 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受众巨大需求的体现。

一项针对华侨华人接受与传播中华文化行为的调查显示，在获取中华文化的途径上，以频次计算，报纸占 41.1%，电视占 40.1%，现实人际传播占 33.7%，广播占 30.9%，门户网站占 40.8%；在传播中华文化的途径上，以频次计算，依次是专业媒体占 48.5%，现实人际传播占 33.3%，弱关系社交媒体占 30.4%，门户网站占 30.2%，BBS 论坛占 26.2%，强关系社交媒体占 23.4%，网络直播占 0.9%，其它占 1.7%；88.6% 的专业人士赞同或非常赞同华文媒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78.6% 的专业人士认为华文媒体是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③。可见，海外华文媒体是沟通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的桥梁，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国形象、增进大国外交方面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华文媒体在当地仍然是非主流媒体，很难获得华人社会以外的其他社

① 王赓武 《中国文化海外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② 刘康杰 《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华文媒体发展历程及生存框架研究》，《当代传播》2019 年第 3 期。

③ 李沁、王雨馨 《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中华文化传播行为研究》，《当代传播》2019 年第 2 期。

会资源。在接受调查的海外华文媒体中,有所盈余的华文媒体仅占 28.6%,而大部分华文媒体处在盈亏平衡点上,甚至无法盈利^①。东南亚是世界首家海外华文媒体的诞生地,媒体数量占全世界海外华文媒体数量的 21.1%^②,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对华文教育普遍的打压,华人移民和新一代华裔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社会主流语言,华文水平普遍下降,东南亚华文媒体面临受众市场萎缩的困境。统计数据显示,20 世纪 70—90 年代末,东南亚十国华文报刊由 1082 家锐减到 655 家^③。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的政策,将对华文媒体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可积极推动国内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携手合作、互利双赢。一方面,鼓励国内的广告资源投入,多渠道增进海外华文媒体的经费来源等;另一方面,借助华文媒体向海外积极推介中国。中国政府获得海外华文媒体的支持,凝聚海外华文媒体的力量,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作用。

因此,重视海外华文媒体工作,一方面,可借助华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提升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一方面,通过让海外华文媒体传递中华文化,可进一步增强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强化华人族群意识。

3. 注重塑造大国形象,争取华人群体的认同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已毋庸置疑,但由于中国国际舆论斗争经验不足,始终没有获得与自身实力、付出努力相对应的国际形象。西方媒体不断炮制的“人权问题”“宗教问题”“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刻意丑化中国形象,导致已经进入第三、第四代的东南亚华人群体,在对中国不够了解的情况下,难免受到影响。

在对东南亚华人群体的宣传中,中国应当有意识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危机事件中展现国家担当。例如,21 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各地坚决而有力的抗震救灾和国际性撤侨行动,在海内外华人群体中获得了广泛好评,甚至在许多救灾及撤侨事件中,出现了当地华侨华人自愿当志愿者的感人事件^④。在应急事

① 郑文标 《海外华文媒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编辑之友》2012 年第 12 期。

② 郑文标 《海外华文媒体现状调查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28 页。

③ 黄耀东 《东南亚华文媒体现状和出路》,《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 年第 9 期。

④ 参见(希腊)兰孝程 《希腊华侨华人助力利比亚撤侨行动侧记》,《统一论坛》2011 年 4 月 23 日,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1ndeq/201210/t20121018_3197287.html; 章临曦 《守望相助 传递温暖——浙籍侨团援助乌克兰撤侨工作综述》,《浙江侨联》2022 年 3 月 18 日,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204802 《多国侨团倾力协助中国政府从乌克兰撤侨 “有同胞的地方就有家”》,2022 年 4 月 14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046174969116961&wfr=spider&for=pc>

件的处理中，注重塑造我国“外交为民”的大国形象，表明我国政府对于华侨华人生命安全以及海外利益高度重视的态度，无疑会提升海外华人群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

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除了我国官方媒体渠道，也要注重海外华文媒体以及自媒体的作用，特别是应借助海外华文媒体拥有的本土优势，甚至是跨国优势，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通过海外华文传媒进行客观的、多角度的宣传，向海外华人以至全世界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可进而提升海外华人群体对中国的认同以及中华文化自豪感。

结 语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全面增强，对东南亚各国华人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对于中国、东南亚各国以及华人群体自身，都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重要问题，关系到东南亚各国内政的稳定，也关系到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不仅必须遵从东南亚华人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需要一定的制度引导。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维护国家形象、发展与地区国家关系、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因此，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考察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化的路径依赖，提出维持和提升东南亚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突破方法，对解决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周边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吴宏娟】

The Construction of Vietnam's Maritime Milit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WANG Daozheng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impacts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and a key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ny uncertainties interfering with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maritime militia is a front-line mobile force deployed by Vietnam in the illegally occupied islands and reefs and claimed jurisdictional waters, it not only engages in fishing labor to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implements official maritime action orders, aiming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the complex South China Sea situation. As the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velops in a complicated direction, Vietnam actively supports Western hype about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called "gray zone"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maritime militia to strengthen its illegal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Vietnam's maritime militia construction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ed attention, enhanced specialization and stronger military color, which has pos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China's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Vietnam; Maritime Militia Force; "Gray Zone" Strategy; China-Vietnam Relations

【Author】 WANG Daozheng, Lecturer,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Breakthrough of Chinese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ZHANG Shuw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under institutionalism,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h lock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identity from overseas Chinese to ethnic Chinese, and the path dependency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ethnic identit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the host countries, reveal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various historical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policie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ontingent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roposes a path-breaking approach to en-

ha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ubjects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identity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stitutionalism; Institutional Change; Chinese Culture

【Author】 ZHANG Shuwen, Lecturer, Law School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